



在遗址上新建的桃榔庵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← 清代桃榔庵图。 图片来源：朱玉书《海外奇踪》

贬谪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缘何安然无恙？ 苏东坡的坎途贵人

■ 韩国强

元符三年(1100年)五月，苏东坡遇赦北归，游金山寺看到李公麟为他画的小像，动情地题诗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苏东坡为何看重黄州、惠州和儋州呢？究其缘由，因为他落难时，“亲友皆疏”，门生也多畏避不见，而“三州”的太守徐君猷、詹范、张中却格外袒护东坡，成为他这个“有罪之臣”的贵人。

人物春秋

徐君猷 “相待如骨肉”

元丰二年(1079年)十二月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，责授黄州团练副使，“不得签书公事”。第二年正月，苏轼由差人押解，抵达黄州。时任知州陈轼将他安置到定慧院暂住，随后将临江皋亭修葺一新，让苏轼和家人入住。

第二年七月，徐君猷接任黄州知州。徐君猷，本名大受，君猷是其字，以字行世，祖籍东海建安(今福建南平建瓯)，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，史料称其“家世名臣，始终循吏”“绰有建安之风流”。

徐君猷到任后，对苏轼呵护有加。元丰四年(1081年)二月，苏轼因俸薪断绝，“问人乞米”，徐君猷拨城东北旧营地五十亩给他躬耕。苏轼躬耕自食，一家老少得以吃饱。他高兴地吟道：“雨洗东坡月色清，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贫贱头角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从此，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

徐君猷也是位风雅人物，非常好客。他听到苏轼抱怨黄州市上所酿酒味恶劣，所以每得好酒，不但招他来喝，且更携酒见过。苏轼有《浣溪沙》词记其事：“醉梦昏昏晓未苏，门前辘轳使君车。扶头一盏怎生无。废圃寒蔬挑翠羽，小槽春雨滴真珠。清香细细嚼梅须。”苏轼《南乡子·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》《醉蓬莱·重九上君猷》也有他们节日饮酒欢乐的记载。

有一次，苏轼与朋友在江上饮酒，醉而归，作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有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句。顿时，黄州传苏轼驾舟长啸而去。徐君猷闻讯，立即前往临皋亭，苏轼鼾息如雷，不觉大笑。

因有宽松的环境，苏东坡才得以创作千古绝唱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。

徐君猷与苏轼之交，没有长官与谪官之

间的隔阂，而且关系亲密。苏东坡给一封信中曾写道：“某始谪黄州，举目无亲，君猷一见，相待如骨肉。”

詹范 “父老相携迎此翁”

元祐八年(1093年)九月，高太后驾崩，哲宗皇帝急欲彻底变革，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。章惇为相，报复元祐诸臣。十多天内，苏东坡被三改谪命，最后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

宋不杀大臣，以贬岭外为最重的惩罚。绍圣元年(1094年)十月二日，苏东坡抵达惠州，有诗云：“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”

惠州太守詹范破例招待苏东坡暂住合江楼。此楼是三司行馆，招待宾客用的。因

合江楼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，苏东坡住了半月，便搬到嘉祐寺去住。

詹范，字器之，崇安县(今福建武夷山市)星村黄村人，嘉祐八年(1063年)进士，苏东坡称其为“仁厚君子”。

詹范每到佳节便与苏东坡对酒欢歌。绍圣二年(1095年)上元夜，詹范带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陪东坡过节，东坡有感而发，作《上元夜》诗，“使君置酒罢，箫鼓转松陵”“浩歌出门去，我亦归膏腴”。一月后，苏东坡携白酒鲈鱼，回访詹范，作诗：“醉饱高眠真事业，此生有味在三余。”

《苏轼诗集》收录东坡与詹范唱和诗有《惠守詹君见和，复次韵》《詹守携酒见过，用前韵作诗，聊复和之》。诗中用王弘与陶潜故事，说詹范相待甚厚。

詹范是位清明好官，任职惠州时，兵荒之后，野多暴骨，詹范取而掩之。“江干白骨已衔恩”是对詹范此举的礼赞。东坡还特作《惠州祭枯骨文》《葬枯骨疏》盛赞詹范的善举。

惠州有东江穿城而过，江水暴涨，桥易冲坏，不便百姓出行。东坡采用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，改用船桥。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，东坡捐出犀带，建成东新桥。

张中 “邦君助奋锄”

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十七日，苏东坡被责授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。东坡携幼子苏过渡海，同年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城(今儋州中和镇)。

张中，开封人，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，元丰二年(1079年)任明州(今浙江宁波市)象山县尉。张中比东坡晚一个月到儋州。

张中到任后得知东坡父子露宿桃榔林中，十分难过，当即派兵修葺破旧不堪的驿舍，让东坡父子居住。

那时朝廷新党进一步发起对元祐党人

的迫害，章惇时时关注东坡的动态。被他派去南下察访的董必发觉东坡居住驿舍，立即命小使赶赴儋州将东坡逐出。

张中对朝廷的惩罚并不畏惧，反而与儋州黎民百姓向东坡伸出热情之手。苏东坡《和陶和刘柴桑》云：“邦君助奋锄，邻里通有无。”这个邦君就是张中。有了张中的“助奋锄”与十数学生“躬泥水之役”，东坡很快就有了“新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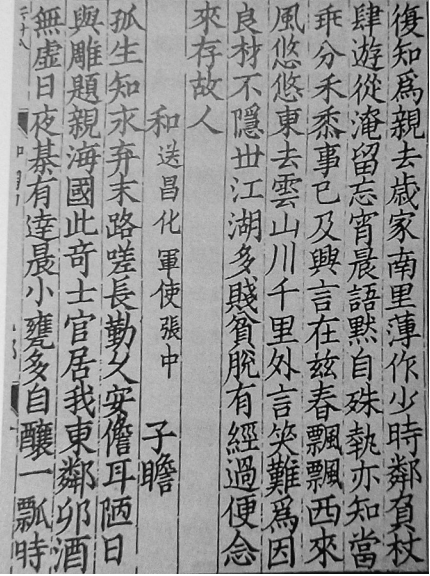
桃榔庵是东坡晚年的精神家园。他在这里著书立说，撰写“三书”，完成了“和陶诗”；他在这里向百姓劝和，劝农，劝学，劝医；他在这里与张中饮酒观棋，谈古论今……

苏东坡初到儋州时，当地学风不盛。他的《和陶示周掾祖谢》记录当时儋州的教育现状。有感于此，与张中同访黎子云，商量建一间学堂，传播中原文化。苏东坡的《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并引》记载了这件事，名其屋曰：载酒堂。“堂因公而不朽，儋因堂而增重”。张中与东坡功不可没。

因对苏东坡的关照，张中后来被罢官。但他仍在儋州逗留近一个月，陪伴东坡，不忍离去。东坡与张中分别前，写下三首送别诗，第一首诗记叙与张中的深情交往，抒发离情别绪；第二首诗写张中来告别，夜坐不去。诗中浓墨重彩抒写与张中的离别之情；第三首诗赞扬张中的才华，对其遭遇深表同情，激励他为国报效。

第一首为和陶诗之一的《送昌化军使张中》：“孤生知永弃，末路嗟长勤。久安僇耳陋，日与雕题亲。海国此奇士，官居我东邻。卯酒无虚日，夜棋有达晨。小瓮多自春，一瓢时见分。仍将床梦，伴我五更春。暂聚水上萍，忽散风中云。恐无再见日，笑谈来生因。空吟清诗送，不救归装贫。”

张中被降职为雷州监司，在北归途中病故。清代著名学者王文诰在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赞美张中“拙于一时，而申于千古，可谓贤矣。”



苏轼的和陶诗《送昌化军使张中》。
影印宋刊本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

崖州三线纺车 纺纱工具升级的民间版本

■ 吉承湖

主轴轮和四轴传动。

脚踏杠杆位于机架前端，呈L形，当操作者脚踏踏板时，杠杆绕支点上下运动，通过连杆带动主轴轮旋转，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，这一设计比手摇纺车更符合人体工学，可通过腿部肌肉发力，持续提供动力。

主轴轮直径约0.5米，轮缘均匀分布着12个木质齿牙，以风叶形式设计，可减轻重量，既保证旋转时的惯性，又不会因过重而消耗过多体力。



白沙河谷博物馆收藏的三线纺车。
袁金华 摄

从去籽、弹花到纺纱、织布，工序烦琐，而纺纱环节的瓶颈尤为突出，使得棉布价格高昂，难以普及。

黄道婆的三锭纺车采用脚踏传动，与白沙河谷的三线纺车在原理上一脉相承，但在细节上因地域差异略有不同：江南的三锭纺车主轴轮直径更大，约0.6米，传动比更高，适合纺制细纱；而海南的三线纺车因热带地区棉花纤维较粗，主轴轮稍小，纺锭线槽更宽，适合粗纱纺制。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地域适应性改造，黄道婆的技术并非简单复制，而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根发芽，演化出各具特色的地方版本。

三锭纺车的革新意义，首先体现在生产效率的飞跃。单锭纺车每人每天最多纺3两纱，而三锭纺车可达9两以上，若操作者技术娴熟，甚至可达1斤(旧制16两)，效率提升3至5倍。

无独有偶。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，英国也发明了三锭纺纱机，即“珍妮纺纱机”，其基本原理与我国古代的三锭纺车惊人相似。这一事实足以证明，中国古代在纺织机械领域的技术水平曾长期领先世界。

咖啡初传中国时

■ 周惠斌

咖啡发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。coffee一词的通用汉译名“咖啡”，最早见于1819年马礼逊编纂的《华英字典》，但在清末的报刊书籍中，它另有五花八门的译名，如“茄非”“珈琲”“考非”“高啡”“磕肥”“伽榧”等，不一而足。

林则徐编译的《四洲志》中，至少有“架非”“加非”“架飞”三种写法。1866年，为培训服务于洋商和传教士的中国人学会烤面包、做西点、煎牛排、煮咖啡，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，用汉语编写了一本私家食谱《造洋饭书》，介绍了268种西菜、西餐的做法，书中将咖啡译为“磕肥”。1873年9月22日，《申报》刊登《电报英京巨银行闭歇事乃系讹传》一文，将咖啡译为“加非”；1875年11月10日刊登的一篇《轻生说》中，首次出现“咖啡”二字。1887年刊印的《申江百咏》中，有一首竹枝词“几家番馆掩朱扉，煨鸽牛排不灰肥。一客一盆凭大嚼，饱来随意饮高啡”，将咖啡译作“高啡”。直到1920年代后期，coffee才有了相对统一的译名“咖啡”。

作为舶来品，咖啡传入中国，是在鸦片战争之前。彼时，清王朝闭关锁国，通商口岸仅广州一个。1836年前后，在今天的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附近，丹麦人开设了一家西餐厅，以浓郁的咖啡香味吸引了众多外国顾客，成为广州、也是中国第一家经营咖啡的场所，标志着中国咖啡文化的开端。

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咖啡最迟在1844年进入上海。据一册名为《OR7400 各号验货》记载，1844年5月18日，“第19号船，公正行进口枷榧豆



5包，每包70斤……”而当年在上海，购买咖啡豆的唯一途径是拍发行。彼时，上海还没有独立的咖啡馆，仅外国人开设的一些饭店、夜总会、俱乐部中才设有咖啡室，如1846年对外经营的礼查饭店，咖啡室即附设于旅馆之中。《上海通志》记载，1853年，英国药剂师劳惠霖在大马路(今南京东路)花园弄1号开办老德记药店，以经营欧美成药为主，兼营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烟酒、糖果、冷饮等，但所提供的咖啡，最初却被老上海人视为“咳嗽药水”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上海的番菜馆(西餐馆)开始以餐后饮料——咖啡招揽顾客，引得国人纷纷尝鲜，《申报》曾在1876年刊登番菜馆的咖啡广告。据《清稗类钞·西餐》记载，1883年，位于今福州路、山东路口的“一品番菜馆”，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西餐馆，餐后供应“咖啡一盞”，从此，到咖啡馆吃西餐、喝咖啡成为一种时尚。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，是1886年公共租界内的虹口咖啡馆，但只向海员开放。1906年，福州路上的宝利咖啡店，是上海第一家正式对中国人开放的独立咖啡店。

1920年代后，营业性咖啡馆在上海大量涌现，逐渐形成规模化的街区咖啡馆。其中，著名的有卡尔顿咖啡馆、皇家咖啡馆、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、惠尔康咖啡馆、沙利文咖啡馆、上海珈琲馆和公啡咖啡馆等，它们多由法、俄、意、日侨民和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开设，主要分布在被称为“小彼得堡”的霞飞路(今淮海路)、“神秘之街”的北四川路(今四川北路)和“小维也纳”的汇山路(今霍山路)等三个区域。随着咖啡文化的日益普及，咖啡开始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喜爱，成为与茶相媲美的饮品，以致不同形态的咖啡，如咖啡粉、咖啡霜、咖啡糖、咖啡汁、咖啡茶、咖啡糖浆等，走进了千家万户……1926年，《兴华》杂志报道，上海每年购入咖啡约在千万元以上。

与此同时，咖啡在广州、天津、汉口、北京等城市也日渐兴盛。民国时期，北京西单的英林咖啡馆、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，以及葆荣斋咖啡馆，是老北京的三大咖啡馆。1935年，北京学生掀起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总指挥部就设在西单一家咖啡馆的二楼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小型咖啡馆在上海骤然增多，从南京路外滩至静安寺，沿线有咖啡馆30余家。到1946年10月，整个上海有咖啡馆186家，加上西餐馆、喝咖啡的场所多达297家。

百年来，浓郁的咖啡与都市人群摩登洋气的消费观念不断融合，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馆，更是见证了传统与现代、东西方文化在现代都市的邂逅乃至水乳交融，成为市民聚会聊天、休闲社交的活动空间。

(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